1. 引言

引言（刘老师）：广为接受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将通过促进社会和文化变革，实现民主转型。然而，尽管中国的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156 美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10,500 美元，同时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中产阶级扩大、城市化迅速发展、社交网络爆炸式增长，但中国共产党 (CCP) 并未面临日益增长的民主变革社会压力。与预测相反，中国的政治体制享有极高的合法性。在亚洲民主晴雨表调查 (ABS) 中，当被问及“您是否对中国的民主运作方式感到满意”时，2002 年有 67.2% 的受访者回答是肯定的，到 2019 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 74.6%。来自各种来源的调查一再证实了同样的信息。基于现代化理论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判断似乎未能实现。因此，许多人将中国视为该理论的一个例外。中国例外论是真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仅通过观察中国的总体文化趋势来回答这些问题是误导性的，这不仅是因为总体趋势掩盖了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不同动态，还因为它们模糊了中国价值观演变的机制。中国一直是现代化理论的例外，但是

我们的研究结果丰富了现代化理论，确定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之间的“拦截”力量。

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穆斯林世界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高得惊人

* 1. 当前对中国民主的评价/民主观念的探索
  2. 世代差异：在单个社会内部,大众政治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变化是通过代际替换 (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实现的: 与老一代相比,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物质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而由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成年以后趋于稳定, 这 就 导 致 了 一 个 社 会 总 体 上 价 值 观 念 变 化 的 代 际 替 换 效 应 ——— 随 着 老 一 代 的 离 去 , 社 会 逐 渐 由新一代填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发生了总体上的变化。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意 味着政治的变化: 在投票行为以及其他的政治参与方面,抱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人表现 出新的特征,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理解也会超越小社区和民族主义,而倾向于拥抱超国家的身份认同; 这种超国家或全球主义的全新认同与关怀又会影响到个人对环境、平等、福利等政治议题的看法。

匮乏假设认为,人们的优先目标是对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如果资源相对短缺,人们就会给予它最高的主观价值。社会化假设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 在未成年时期的盛行条件,即对安全的感知。4 这两个假设分别关注到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化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前者可以推导出短期变化或阶段效应,后者则可以推导出长期的群体效应。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两个普遍的 “文化转移”,此即从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的观念转移和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的转型。后者实际上是扩展版的后物质文化主义转移,即从强调物质安全、经济保障向强调生活质量、个人实现与表达的价值观转移。超越物质匮乏之后,人类追求的价值开始向精神世界和个人实现与归属的范围转移, 这构成了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实现了传统价值观到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权威从社会转移至国家。当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达到临界点后, 则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向后现代化的转向: 对经济成就、物质安全的强调让位于对生 活质量、自我表达的强调,体现出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 / 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经济增长或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稳定与持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 家和地区均呈现出趋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态势。这种转变在政治领域就表现 为对权威的淡化,以及对参与和自我表现的日益强调,4 同时这两个价值观取向促进了民主的建 立、维持与巩固,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强化了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与能力,转变了大众政 治参与的形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人们的价值观优先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即 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

1. 理论
   1.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与民主：很多研究提出现代化理论有助于经济的发展。XXX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经过文化这一中间因素。英格尔哈特。具体到中国，现代化理论却失效了。

真的是这样吗？即有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横截面，即使有历时性研究，也是基于某个时期的观察，并没有看出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这里需要解释，时期差异不同于世代差异（英格尔哈特的那篇文章里对世代差异有很好的解释），如果每个世代的民主观确实在缓慢发生变化，那么给民主一定的时间，起码一代比一代在进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也不是一天形成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也持有批判观点，比如XXX。

现代化理论对观念的改变：根据现代化理论，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教育和收入水平，从而增加了人们的智力和物质资源。它带来了自主权，提供了更多的生存安全，从而增加了对自我表达价值观（如性别平等和公民自由）的支持。同样，现代化进程导致宗教信仰从更僵化和教条的形式转变为更灵活和自由的形式，这也带来了对民主的更多支持。5 这意味着宗教信仰程度较低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民主，因为他们更强烈地支持与宽容和个人自主有关的文化价值观。6 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有一条通往民主的共同道路”7 ，从而表明所有这些过程预计会以类似的方式在所有社会中发生。

尽管先前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也存在缺陷。关于理论缺陷，先前使用现代化理论的关于民主支持的研究没有研究价值观的中介作用。然而，价值观的变化是将社会经济发展1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主要解释机制。因此，如果不研究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就很难严格检验现代化理论。

LY：

现代化理论是什么：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民主转型，因为它传播教育、扩大中产阶级、加速信息和思想交流、降低动员成本并增加物质资源。2 尽管该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分歧，双方都有怀疑论者和捍卫者，3 但它仍然是解释政治转型的主导框架之一。然而，中国已成为一个异类。尽管迄今为止学者们观察到中国的影响好坏参半，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共仍然享有极高的合法性。近期的研究倾向于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描绘出更为悲观的前景。关发现，收入和教育与民主诉求无关。5 金和周发现，最年轻的一代，即“习一代”，更倾向于威权主义。6 换句话说，中国仍然是“比较民意研究中令人困惑的异类”。

世代差异文献综述：金和周将政治社会化作为解释中国青年自由主义价值观倒退的一个因素进行研究，但他们没有详细阐述其中的机制。30 陈和杨展示了互联网审查在改变价值观方面的有效性，但他们的方法是在精英大学生中进行的实地实验，这限制了推广的范围。Cantoni 等人。研究表明，课程改革显著地影响了中国学生的价值观，但他们的发现也是基于一项高校调查。

现代化与民主水平呈正相关这一命题可能是民主化文献中最著名的命题，也是在大多数定量全球研究中得到最多检验和支持的命题之一。7 甚至有人声称：“截至今天，现代化有利于民主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 利普塞特9 最初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维持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正如博伊克斯和斯托克斯10 所强调的那样，民主是由伴随发展而来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收入本身。

**首先，根据公民文化观点的支持者，拥有民主价值观的积极公民的存在是民主的核心**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 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稳固。李普赛特是第一 个系统阐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 , 其论文 《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 (1959)被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普赛特指出 , 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 而他要从 “一个社会学的 和行为主义的角度”[

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宏观理论： 它描述了宏观发展如何影响总体价值观和民主支持，并最终导致民主制度的形成。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可以通过群体更替来解释：具有传统价值观的老一代群体逝去，被年轻的群体所取代。世俗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在年轻群体中预计会更普遍，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物质保障（社会化假说），而且他们目前生活在更好的经济条件下（稀缺假说）。22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群体更替将导致这些世俗和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普及率更高。这里的主要论点是，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例如一个国家的 GDP，会影响微观价值观。

先前的研究表明，价值观也受到微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23 例如个人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因此，社会化和稀缺性假设可以转化为微观层面：当前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童年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个人价值观。先前的研究主要支持稀缺性假设，而不是社会化假设。24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个人对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认可和对民主的支持。具体来说，我们关注对性别平等和社会政治宽容的支持，作为自我表达价值观的主要指标。对性别平等的支持是指“工作、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平等”。25 宽容包括“完全接受、尊重、肯定和欣赏宗教、民族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26 不同的研究对宽容使用了不同的标签，例如“社会宽容”27 和“政治宽容”。

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是共同的（Lerner，1958；Lipset，1959；Lipset、Seong 和 Torres，1993），这条道路始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终于政治现代化。正如 Coppedge（1997）所简要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将经历一个政治现代化过程，其最终状态，即稳定的民主，将随着它们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大众媒体的普及和教育、财富和平等水平的提高而实现”（第 177 页）。就现代化理论对个人层面的影响而言，现代化被认为会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持有和欣赏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此

然而，事实证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比这种线性经济模式更为微妙。“多重现代性”可能是现代化力量与一个国家现有的文化和制度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Eisenstadt，2000，第 13-15 页）。这可能会在国家间产生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态度和经济条件。此外，当考虑阶级与国家关系时，这种关系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性质。首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不一定反对威权主义做法。有人认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只有在他们体验到相当大的独立于国家的情况下才会挑战威权主义做法（Kamrava，2005）。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威权国家通过提供工作和福利（例如免税收入）控制其公民的很大一部分行为，现代化进程可能不一定会创造出民主导向的公民（Bellin，2002；Kamrava，2005）。

认为现代化后公民物质条件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对于解释民主取向至关重要。我还测试了社会资本理论和宗教价值观方法作为支持民主的替代解释的含义。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化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如性别平等和宽容的观念，以及物质条件，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是穆斯林世界个人支持民主的良好预测指标。

工具主义/功利主义：

Gu 和 Bohoff 52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穆斯林社会中对民主的支持是工具性的：个人对民主的支持是受他们认为民主将带来更多繁荣和更高生活质量的看法驱动的。相反，在天主教社会，个人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英格尔哈特53 所称的自我表达价值观。Bratton 和 Mattes54 也通过经验证明，对民主及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取决于公民的期望和评价，而非自我表现价值观。Houle 和 Miller55同样支持工具主义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认为自己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进步的人更支持民主，但这种效应只有在当前政权是民主政权而非非民主政权时才会成立。他们的研究以非洲晴雨表和拉丁美洲晴雨表为基础，调查了 33 个民主和非民主国家。

Tezcür 等人57 和 Bratton58 对政治背景大相径庭的民主支持进行了调查，同样得出了民主支持是工具性的结论。Bratton59 研究了四个非洲国家（马里、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他解释说，尼日利亚穆斯林对民主的满意度高于非穆斯林，因为他们可能意识到多数统治对他们有利。

现代化理论与工具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教育水平和收入与所有国家的民主支持率呈正相关，而后者则认为这些变量与民主政体的民主支持率的关系不同于专制政体。

现代化理论仍然是解释民主态度的有力工具

目的论解释现代化理论存在问题的第二个原因与它的文化含义有关。尽管人们期望现代化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财富与教育的增加来培育大众的民主价值观和信仰，但尚不清楚这些价值观和信仰是如何产生的，也不清楚它们是民主化的原因还是结果。此外，现代化理论最有力的支持者 Lipset (1994, p. 3) 宣称，对于民主的前景而言，文化因素比现代化更重要，某些信仰，如伊斯兰教、基督教正统派和儒教，从根本上与民主价值观是不相容的。Inglehart (1990) 认为，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变革，进而导致民主。最近，Inglehart 和 Norris (2003) 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真正分歧不是政治。相反，他们声称，两种文化之间的分歧在于与性别平等和容忍度观念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随着人们迁往城市地区，接受更好的教育，财富增加，他们也有望变得更加世俗化，更加接受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且总体上更加社会宽容（Jamal，2006；Moghadam，2003）。Hoffman（2004）和 Jamal（2006）在他们最近的分析中找到了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根据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解释，可以预期，对性别平等有积极看法和更宽容的人，与缺乏这些看法的人相比，会更支持民主。

* 1. 民主观念：功利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

民主观念的重要性：民主不仅需要某些政治制度安排，还取决于某些规范和价值观。1 因此，民主制度的生存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公民对民主的积极态度。2 因此，研究这些规范和价值观以及人们对民主的态度非常重要。当前关于民主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

民主观念：程序性民主vs 功利性民主

程序性民主是什么：  
功利性民主是什么

两种话语的区别及其对上述两种话语的差异对于人们如何评价政府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要素，流行的民主概念对民主巩固的前景有重大影响

围绕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来组织民主的含义由来已久。熊彼特对“古典民主学说”与“民主领导竞争理论”的阐述，深刻地抓住了这场争论的核心，前者将民主与实现“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后者则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联系起来。他对后者的坚定捍卫为现代政治科学中的民主概念奠定了基础（Schumpeter，1994 年）。达尔对“实际民主”的阐述（Dahl，1972 年），以及其他学者对极简主义民主概念的辩护（Popper，2020 年；Przeworski，1999 年；Schmitter &amp; Karl，1991 年）也秉持同样的思路，这表明，尽管政治理论家们仍在积极讨论民主的定义特征，但实证研究已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称“程序性民主观念”为强调制度公正性（如自由公正的选举、制衡和尊重公民权利）为民主的基本特征。我们称“功利性民主观念”为强调治理结果（如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将特定宗教纳入法律）为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并不一定持有程序性或功利性的民主观念。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大多以混合方式解读民主。因此，当我们谈论以民主观念衡量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指的是持有不同比例的混合观点。还应该澄清的是，这两种民主观念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许多民主程序强大的国家也提供了丰富的效用。但这种关系并非一定能实现，因为要弥合两者之间的差距往往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程序和结果之间的差距恰恰成为民主韧性的考验。

自由民主话语强调利用制度安排就公共问题达成集体决策并确保良好治理。这些安排的核心是竞争性选举以及制度化的政治权利保护。该制度不仅允许人们就政策问题向政治领导人施压，还赋予他们通过既定程序更换政府的权利。从本质上讲，在这种话语中，民主至少被描述为一个政府，它建立在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制度保证了一些基本自由，并确保人们参与、选择领导人和集体为社会做出决策的权利。

Shitianjian：

民主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概念。不同国家的人们赋予这个词不同的含义（Canache，2012；Dalton 等，2007；Mattes 和 Bratton，2007）。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这种“模糊民主综合症”也会影响普通公民和政治精英（Crow，2010；Miller 等，1997）。得益于调查行业的蓬勃发展，比较民意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数据，了解人们将民主与各种属性联系起来。然而，当谈到不同民主观念的政治含义时，结论却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个人对民主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对民主表现的需求和满意度（Crow，2010；Mattes 和 Bratton，2007），以及他们对参与活动的态度（Canache，2012）。其他学者则否认，民主的不同含义在比较民意研究中具有任何意义，特别是涉及民主政治经验有限的社会的研究（Anderson，2002）。从理论上讲，我们预计成熟/巩固中的民主国家中关于民主的思想和话语之争与威权社会相比有明显的侧重点。鉴于民主政治的持续和长期经验，一些基本价值观和制度（如政治权利和竞争性选举）的合法性在成熟/巩固中的民主国家中已被广泛接受。同样，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主国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即是否应该将更多的权重放在保护政治权利上，还是放在良好的社会经济表现上。  
关于威权社会的民主观念：例如，当一些威权社会的公民表示他们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民主最重要的特征时，这应该被解释为这样一种信念：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除了制度化的政治竞争和权利保护之外，还应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应该被解释为这样一种信念：任何能够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权都是民主的？显然，威权领导人热衷于向公民灌输后一种理解，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民主外表，以及一个有效的话语武器，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民主转型压力。不幸的是，现有的剩余类别方法无法区分这两种解释。

人们不应该假设所有公民对民主的看法都类似，而应该从实证的角度来探讨以下问题：一个国家内的个人和群体对民主的看法是否存在共同点，不同国家对民主的看法差异有多大，以及这些看法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我想问的是公民对民主的看法是否对政治有影响。大众对民主意义的看法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某些观点是否与某些政治态度和行为有关，而与其他无关？

尽管学者们一直试图提出概念和分析工具来捕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后权威主义政权的多样性，但最广泛使用的民主概念化仍然侧重于程序考虑。在熊彼特（1942/1976）和达尔（1971）的传统中，这种观点以竞争性选举和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为中心，将其作为民主的黄金标准，而与社会经济和社会特征相关的问题，如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或腐败，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政治进程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民主本身的特征（Collier &amp; Levitsky，1997；Karl，1990；参见 O&#39;Donnell，2004）  
  
比较研究成果提供了证据，表明新兴民主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对民主的理解是复杂而多方面的（Bratton 等人，2005；Bratton 和 Mattes，2001；Camp，2001；Carrington，2008；Dalton 等人，2007a，2007b；Miller、Hesli 和 Reisinger，1997；Ottemoeller，1998；Sarsfield，2007；Schedler 和 Sarsfield，2007；Shin，1999）。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试图描述公民对民主的不同看法。大量研究证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但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例如，几乎没有人（如果有的话）致力于揭示公民对民主的看法差异的含义。如果民主对某些人意味着某些东西，而对其他人则意味着其他东西，那么这些差异是否会产生影响？  
  
很少有研究探讨公民对民主的看法变化所产生的后果。例如，定义民主的能力是否会影响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评价？对民主有复杂看法的人是否更有可能支持民主？主要从自由角度理解民主的人的行为是否与强调社会和经济结果的人不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研究了民主概念的结构和内容对民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影响。

我期望对民主有“厚”的理解，以多方面的方式定义民主，将与对民主的更高支持和对民主原则的更高支持相关。

布拉顿和马特斯 (2001) 对非洲公众舆论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表明，规范性和工具性考虑指导着对民主的评估。最近，马特斯和布拉顿 (2007) 发现，对民主的更高要求与从程序的角度看待民主有关。用马特斯和布拉顿 (2007) 的话来说，“似乎通过程序的视角看待民主会使人们对他们可以期待的权利和自由更加敏感，并增加了他们拒绝那些不能提供这种保障的政权的可能性”(第 202 页)。在美洲，Carri6n (2008) 提出了一种类型学，将民主分为规范性、工具性、空洞性和贬义性。在实施这一分类时，他发现，以规范性术语定义民主与民主支持的关系只比以工具性术语定义民主略高，但以消极术语定义民主与较低的支持关系。

民主的定义包含了政治过程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方面以外的其他含义——基于社会结果的定义和对民主的消极定义，应该会减少对民主的支持和对民主原则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内在的，基于对民主所体现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欣赏，而民主本身就是目的？还是支持反映了一种更具工具性的算计，即政权更迭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最常见的是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政权巩固有直接影响。内在支持是对民主的承诺，无论好坏；因此，即使在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它也有潜力维持脆弱的政治政权。相比之下，工具性支持是有条件的。它是根据时代的气质而给予的，也可能很容易被撤回。如果公民评价政权主要看其提供消费利益或纠正物质不平等的能力，那么他们也可能会屈服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诱惑，他们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牺牲政治自由。

然而，我们希望将政权绩效划分为不同的产品组合：经济产品组合（包括经济资产、就业和一系列基本社会服务）和政治产品组合（包含和平、公民自由、政治权利、人类尊严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的居民能够“分别而正确地”区分“一篮子经济商品（可能正在恶化）和一篮子政治商品（可能正在改善）”，那么世界各地的公民都可能这样做。如果在判断民主时，政治商品似乎比经济商品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可以阐明“内在与工具”之争。如果非洲公民将民主视为其本身的目的，那么这种概括可能在全世界都适用。

与此立场一致的是，克劳德·阿克认为非洲人从经济和工具的角度看待民主。他认为“非洲人寻求民主是为了生存”，并认为“非洲的民主运动将强调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权利；它将坚持经济机会的民主化、人民的社会改善和强大的社会福利制度”。9 按照这种表述，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做什么**。阿克的观点的弱点在于它不赋予政治价值观任何内在价值。它无法超越对非洲政治的静态描述，即主要由物质匮乏驱动的“腹中政治”。阿克动情地描写了欠发达的屈辱，但他未能认识到人类是复杂的生物，并非只靠面包生存。  
拉里·戴蒙德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对民主本身的信念是巩固民主的核心因素。在对全球新兴民主国家公众态度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政治的自主性”，它往往压倒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权经济表现”**

**尽管许多南非人（不分种族）都表示他们认同重新分配工作、住房和收入的必要性，但黑人似乎更注重“结果平等”，而白人则强调“机会平等”。**

**XX通过对根据最近对三个非洲国家公民对民主观念的研究得出了，公民对程序性和实质性属性的排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赞比亚人将政治规则置于民主属性列表的首位，而南非人则将这种保障置于物质生活水平改善之后。最后，即使在政治商品类别中，排名也有所不同：赞比亚人（以及程度较小的南非人）将选举置于首要地位，而加纳人将言论自由置于他们自己的民主权利法案的首位。南非黑人将社会经济考虑因素置于民主观念的核心，因为种族隔离制度下存在着综合的压迫结构。在旧政权下，他们一贫如洗，认为实现政治自由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有这些证据，但人们经常担心，许多发展中国家公众对民主的支持缺乏实质内容（Schaffer 1998；Seligson 2004；Canache 2006；Baviskar 和 Malone 2004；Schedler 和 Sarsfield 2004）。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专注于经济需求，没有理由支持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公众不理解民主。民主据称已成为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模糊指称，但这些公众对这一概念缺乏真正的理解。或者，其他研究人员声称，对民主的支持隐含着对西方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支持，而不是对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的支持。或者，民主本身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由于其积极含义，即使是非民主政权也接受它。例如，共产主义东德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产主义朝鲜正式名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本文探讨的是普通民众如何理解民主的问题。当代公众是否对民主的含义有合理的理解，他们定义的内容是什么？人们是否关注民主的程序方面——选举、民主制度和进程——这是民主化努力的主要焦点。或者，他们是否从经济或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待民主？我们利用最近在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广泛民意调查来探讨这些问题。**

**即使我们认识到普通公民对政治和民主的了解程度较低，我们也可以求助于民主理论来确定适当答案的广泛参数。科利尔和列维茨基（1997）指出，最广泛使用的民主定义侧重于治理程序。例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著作（1971，1989）为定义民主的基本要素提供了基准。在《多头政体》一书中，达尔（1971：3）确定了定义民主的八个标准：投票权；被选举权；政治领导人争取支持和选票的权利；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替代信息来源；以及依赖选票和其他偏好表达的机构。与许多其他民主理论家一样，达尔在很大程度上将民主等同于民主政府的机构和程序。如果公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且选举指导政府的行动，那么这就是民主的本质。这种制度/程序上的选举民主定义通常被接受为民主制度的最低标准。从熊彼特（1943 年）到普沃斯基等人（2000 年），民主通常等同于选举过程。同样，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民主建设活动也经常将选举制度的建立作为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预期公民将民主等同于民主治理的制度和程序。这些人会将“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响应式政府”、“多党竞争”和“人民控制”或“多数人统治”作为定义民主的关键要素。其次，与从制度和程序的角度定义民主相比，人们可能会关注民主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这隐含在民主理论的许多文献中。例如，达尔对选举民主的讨论假定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其他权利的存在，这些权利对于使选举竞争有意义至关重要。民主包括强调自由和解放作为其基本目标，而民主制度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这也是民主政治言论的一部分，从《独立宣言》序言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41 年国情咨文中阐述的四大民主自由。同样，拉里·戴蒙德 (1999) 将政治自由、公民的参与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正义和妇女的平等权利列为四大核心民主价值观。**

**虽然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侧重于政治，但民主的公众形象也可能具有社会层面——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人们关注民主政府的目标，就会产生对民主的不同定义。**

**T. H. Marshall (1992) 讨论了民主公民权的社会层面。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外，民主还可以包括社会权利，例如社会服务、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以及确保他人的普遍福利。这种方法认为，除非个人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基本的社会需求，否则政治平等和参与的民主原则就毫无意义（Huber、Rueschemeyer 和 Stephens 1997）。事实上，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甚至有一项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

**民主的社会定义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一些分析家声称，发展中国家当代对民主的支持只是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支持。如果民主与富裕、发达的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那么对民主的支持就意味着希望实现同样的经济标准，但不一定是同样的政治标准。关于民主的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的争论一直是东欧民主转型文献（Hofferbert and Klingemann 1999；Fuchs and Roller 2005）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讨论中的一个持续主题。2 因此，这种倾向会导致公民将经济改善、社会福利和经济保障作为他们对民主定义的关键要素。**

**这三种选择——程序/制度、自由和社会福利——构成了定义民主的主要理论选择。当然，在民意调查中还会出现其他的回应。然而，根据这三种广泛的选择来定义民主的程度，为评估公众对民主的高支持水平以及这些民主愿望的含义提供了一个框架。每种选择对于解读公众对民主的看法以及指导民主化进程的原则都有不同的含义。**

**当代公众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关于公民是否具备政治知识和成熟度来理解基本政治概念的争论也由来已久（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6）。此外，民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不了解政府具体事实或不密切关注政治的人来说。上一节还指出，民主具有多重潜在含义。因此，公众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找工作、提供社会福利或经济机会。例如，韩国、蒙古、南非和智利有相当大比例的公众被编码为在社会福利方面定义民主，**

**为了检验这些理论，我们将对民主意义问题的回答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特征联系起来。9 最明显的预测因素之一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富裕的社会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公众应该能够更好地讨论民主等概念，因此不太可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不知道”的回答。此外，国家富裕程度可能与民主定义的内容有关。例如，民间传说认为，将民主等同于社会福利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在欠发达国家更为常见。同样，我们可能预计权利/自由意识在富裕社会更为普遍。换句话说，如果民主理解的传播存在经济界限，那么这些界限应该在富裕程度和调查回应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我们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调查当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国家富裕程度。**

**案例：**

**看来，大多数公民并不像民主理论文献所暗示的那样，主要从程序或制度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后共产主义公民调查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提到了这些因素（Simon 2001：108）。例如，58% 的波兰受访者将自由或自由作为民主的定义，但只有 8% 的人提到了政府或选举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大多数非洲晴雨表国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提到了制度或程序因素，但这些回应通常远远落后于基于自由和自由的定义。1998 年的 Hewlett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1999 - 1993 年，USIS 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了调查，要求人们在他们认为对国家民主发展最重要的三种政治价值观和三种经济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Mc Intosh 和 Mac Iver 1993）。他们的回答大多将民主等同于繁荣、平等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观。4 1993 年韩国晴雨表调查证实了这种模式，三分之二的民众选择经济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Shin 1999：60）。**

**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表 2 显示了这些国家特征与表 1 中的四类回应之间的相关性。前两行显示了经济发展与公众对民主含义的回应之间的关系。富裕程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略微降低了回答“不知道”的公众比例；但这些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时，富裕公众用社会效益来定义民主的可能性略低（- .10）；但这些差异在统计上同样不显著。国家富裕的唯一显著影响是增加了对自由和解放作为民主定义的重视（.29）。这些模式再次证实了表 1 中的一般印象；对民主的理解并不强烈地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贫穷国家表达民主定义的可能性几乎与富裕公众一样，甚至理解的内容也与国家富裕程度只有微弱的关联。**

**公民对民主的理解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尤其是在民主转型或根本性政权更迭等事件发生时。改变的一种机制是个人转变，公民通过这种转变适应新政治制度下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公民通过体验新的民主秩序来学习民主的意义。例如，“环境可能会迫使、欺骗、引诱或哄骗非民主人士采取民主行为”（Rustow 1970）。新制度下创造的激励措施和公共教育工作也可能影响公民的态度（例如 Higley 和 Gunther 1992；亚洲基金会 2003）。根据这种观点，对民主的理解应该是个人经验的累积，因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认知、情感和评价学习的点点滴滴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整体”（Eckstein 1988）。同样，Rohrschneider（1999）提出了一种制度学习方法，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框架会改变公民对民主的理解。（我们收集了最近经历了民主化政权更迭的七个国家（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关于公众对民主理解的时间序列数据。10 由于最近经历了民主转型，这些国家为研究公众对民主的理解是否会因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化提供了沃土。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比较民主化之后（T0）和之后几年（T1）的反应。）**

**此外，人们还可以寻找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变化模式的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即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相对较小，而这两个指数排名最低的国家，即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率不同可能是因为较富裕国家的公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有更多机会获得有关民主社会的信息，甚至与民主社会互动，这有助于熟悉民主的概念（如果不是实践）。这些条件并不适用于正在经历民主化的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公民**

工具主义：相反，工具主义理论（以下简称“工具主义”）认为，对民主的支持不是价值观变化的结果，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根据这一观点，个人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通过他们的财富或教育水平来衡量。8 那些地位高的人维护现状并支持他们建立这种特权地位的现政权。根据工具主义的观点，如果这个政权是民主的，那么社会地位高将导致更高的民主支持。另一方面，当一个人的地位低时，很可能认为现政权至少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更迭是试图提高自己地位的一种方式。因此，在民主政权下，地位低的人的民主支持水平较低。9 因此，在民主国家，社会地位与民主支持呈正相关，但在非民主社会中则不然。

为什么要用私营企业的数据：尽管独立于国家的强大私营部门的发展最终可能开始削弱威权国家的权力并创造出具有民主价值观的公民，

社会化假设：

即人们一旦在青年和童年时期确立某种特征，那么他们成年时也会继续保持这种特征。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提出，人们在成年的过程中确立的某种固定的优选序列会在他们

成年后继续保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未成年的时期确立的，这种价值观的确立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而且一经确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同时这也反映出价值观的转变不是轻而易举地形成的，也不是说便就变的，而是需要很长的时期。由此可以导出，社会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的优选价值观之间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滞后。社会化假设是对匮乏假设的补充，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说明了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新老群体之间在优选的价值观上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此外，社会化假设也表明，未成年时期经历了贫困的人群即使后来取得了物质安全的保障，他们也会选择继续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也就随之提高，同时也会产生较大的代际差异。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两种假设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导出一系列对价值观变革的稳定预测。

价值观转变：

正如英格尔哈特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描

述的那样：“西方公众价值观业已从过于强调物质福利和身体安全而转向更加强

调生活质量。这一转向的原因和意义是复杂的，但其基本要点或可简单表述为：

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遥不可及的或者没有威胁的东西，毋宁说人们会更加关注直

接需求或者威胁。”①以19 世纪70 年代为基准点，那时6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

物质主义者是后物质主义者的12 倍，但是在“二战”后出生的人群中，也就是1970

年时为25 岁以下，后物质主义者的数量则略微超过了物质主义者。几十年来，随

着较年轻的群体逐渐在社会地位上替代较为年老的群体，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还正在不断地进行。。他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繁荣是紧密相连的，只要国家

经历了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并且给相对比较年轻的群体在他们的成长阶段创造了

较高的经济安全，那么后物质主义就会在那里发生

强调代际：

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年龄、队列和时期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观察到的趋势。此外,这类研究过分聚焦于时期趋势,而忽视主观幸福感在其他时间维度上特别是队列上的变化趋势。在趋势研究中虽然我们可以主要关注一种时间维度,例如,幸福感随时期的变化,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会不可避免地同时涉及年龄、时期和队列三种维度。当忽略年龄和队列而讨论时期变化时,其潜 在的假设是,对于每一个观测时期,年龄和队列的构成基本相似或者不同的年龄和队列不会对观测的 因变量产生分化影响[7]。而在现实情况中,这样的假设常常不成立,那么我们观察到的主观幸福感 随时期的变化可能还混入了因为队列构成不同所产生的队列效应。因此,要真正了解主观幸福感在时 期维度上的变化,需要分离出其中可能的队列和年龄效应,也就是进行所谓的年龄、时期和队列 ( APC) 分析。 当然进行 APC 分析的目的不仅仅限于对趋势的获取上。获得真实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对理 解趋势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年龄效应反映了由年龄主导的身体机能的改变以及社会 角色的转换等内在力量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时期效应代表着与时期变化相联系的改变,它们通 常是由外部环境因素在某个时期的瞬时作用所引起的,包括特殊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 ·91· 新技术的突破等。时期效应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影响力会一致地波及同一个时期所有年龄段的人群。 众多研究所关心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通常以时期效应的方式直接作用在个体的幸福感上。队列效 应,则体现在它的影响集中在对同一时间出生的群体上。这些个体共同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或者社会 变迁,逐渐在他们身上产生相同的烙印,以外力 ( 例如社会重大事件) 与内力 ( 例如个体发展过程) 交互作用的方式通过缓慢积累或者延迟发生来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响。

可以看出,幸福感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趋势有其独特意义。过分聚焦时期维度,会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驱动幸福感变化的一些重要机制以及对整体趋势的解读。特别的,在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趋势 的研究中引入队列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针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所涵盖的时期都相对较短 ( 大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而通过对队列的划分,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获得幸福感在更长时 间范围内的变化趋势,因而可以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关注宏观因素的历史作用。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 宏观因素在时期和队列上的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如果说时期趋势体现了外部因素的瞬时效应,那么 队列趋势则反映了外部因素与个体内在发展的交互作用,即外部的历史因素作用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从而对人群产生了分化。因此,我们需要用生命历程的视角来解释这些宏观因素在队列中的 效用。 要同时估计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趋势效应,并且破除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因素,需要进行 APC 分析。

与此相关，政治学家研究了 "政治社会化"，即 "人们或青少年获得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发展过程"（Powell & Cowart，2002）。Ghitza 和 Gelman（2014）分析了美国总统投票的世代模式。

为了更好地解释代际效应，我们借鉴了之前几项定性研究的结果。Howe 和 Strauss（1991 年）在对美国世代的研究中，将世代定义为出生时间跨度约为 20 年的人的总和。因此，一个人的一生可分为四个不同时期：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Howe-Strauss 的划分是机械性的，而其他著作则致力于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人的世代进行划分（Liu & Zhou, 2002; Schütte, 1998; Yang, 1997）。刘和周（2002 年）提出，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形成不同的消费行为。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不在幸福感上，但这篇论文为我们将中国人划分为不同世代的假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根据文献资料，我们提出了五代不同的中国人，并根据每一代人所经历的独特人生经历为他们贴上相应的标签。这五代人分别是战争世代（1945 年前出生）、迷惘世代（1956 年至 1960 年出生）、幸运世代（1960 年至 1970 年出生）、转型世代（1970 年至 1980 年出生）和接龙世代（1980 年后出生）。6 虽然这种世代划分是主观的，有违我们定量探究世代差异的初衷，但对于下文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此外，我们将事件分为七个时期。时期划分的依据是时期效应和幸福感得分。表 1 介绍了每个时期和相应的事件。